

贪婪与大学生自利倾向的关系:结构权力的调节作用*

李晓明^{1,2,3,4} 孟 员¹ 张斯明¹

(1. 湖南师范大学心理系,长沙 410081; 2. 湖南师范大学交叉科学研究院,长沙 410081;
3. 湖南师范大学文化与社会心理研究中心,长沙 410081; 4. 湖南师范大学认知与人类行为湖南省
重点实验室,长沙 410081)

摘要:贪婪是自利的关键心理成因,自利行为也常发生在一定的权力背景下。本研究以大学生为被试,试图在结构权力的视角下考察贪婪与自利的关系。结果发现,结构权力可负向调节贪婪与自利间的关系,即低结构权力条件下个体的贪婪特质可正向预测其自利倾向,而高结构权力可抑制贪婪外化为自利倾向(研究1),但当凸显权力的不稳定性时,该抑制作用消失(研究2)。研究表明,结构权力有助于抑制大学生的贪婪外化为自利倾向,但权力的不稳定性会降低这一抑制作用。

关键词:贪婪;结构权力;自利

分类号:B844

1 引言

作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是国家建设的生力军,未来将成为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和领导者。目前我国大学生群体中的利己主义倾向呈上升趋势,表现为过分关注自身利益,缺乏责任与担当,甚至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谋取个人私利,这将对社会的稳定与持续发展产生负面影响(黄河,2020)。关注大学生自利倾向的影响因素及抑制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贪婪是哲学和经济学界的热点话题之一(Seuntjens et al., 2015)。贪婪是一种总是想要更多且不知满足的人格特质,不仅涉及对金钱的物质欲望,也包括性、地位等非物质欲望(Seuntjens et al., 2016)。贪婪者为满足欲求往往会损害他人及社会利益(Wang et al., 2019),但内在贪欲能否外化为自利行为常会因行动情景而变(Li et al., 2021)。因此,应重视探索可有效抑制贪婪者自利倾向的重要情境因素。自利行为常发生在一定的权力背景下,一方面,“权力导致腐败”一语广为流传;另一方面,个体在组织中被赋予的权力蕴含着责任与担当,这种组织中的结构权力可抑制其自利倾向(Schaerer et al., 2018)。本研究将以大学生为被试,试图在结构权力的背景下探究贪婪与自利间的关系,这对

于探索如何降低大学生的自利倾向以及思考有效的心理反腐举措具有重要的实践启示。

1.1 贪婪与自利

“人类为什么以及何时会为了自我利益而不惜牺牲公共利益”是心理学、社会学以及组织行为学共同关注的话题。经济学中的自利假说认为个体会以尽可能低的成本寻求最高的奖赏回报,以最大化其在社会交往中的结果(Miller, 1999)。自利指个体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来谋取私利的行为及行为倾向(Batson, 1998),具体涉及贪腐、道德及合作行为等领域。狭义上,自利仅与物质及金钱有关,但更广泛的自利概念包括个体所看重的任何东西,如权力、安全、自尊等(Müller et al., 2008)。诸多个体及环境因素(如道德认同、自尊、地位、权力、空气质量)均可影响个体的自利性(DeCelles et al., 2012; Huang et al., 2011)。

贪婪是导致自利(如欺诈及贪污腐败)的重要心理成因,对社会稳定与经济和谐具有巨大的破坏力(Seuntjens et al., 2015, 2019; Wang et al., 2019)。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看,贪婪起源于人类尽可能获取更多资源以应对不可预测性环境的需要(Chen, 2018)。生命史理论强调不稳定环境中成长的个体缺乏对未来的掌控,强调即时自身利益的满足而不考虑后果(Griskevicius et al., 2011)。因此,

*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1YBA044)。

通讯作者:李晓明, E-mail: lixiaoming - 2007@sohu.com

贪婪会使个体不计一切代价,甚至牺牲他人的利益以满足自身的欲求。以往研究发现,贪婪与自利、最大化、物质主义、冲动性和嫉妒呈正相关,与同情关心、观点采择及自我控制呈负相关(Seuntjens et al., 2015);贪婪者会在资源两难任务中为自己分配更高的金额(Razen & Stefan, 2019; Seuntjens et al., 2015),表现出低亲社会性(Bao et al., 2020),更易出现高债务等经济问题(Seuntjens et al., 2016),也更易参与各种越轨行为(如腐败行为)(Li et al., 2021);贪婪还会减少合作与分享(Van den Heuvel et al., 2022; Wu et al., 2022),增加不道德行为(Seuntjens et al., 2019),令管理者更关注短期盈利而使企业在经济危机中蒙受更大损失(Sajko et al., 2021)。以往研究多考察贪婪对自利行为的促进作用,但也有研究发现,二者的关系存在边界条件。Li等人(2021)发现在强调普遍存在腐败的高腐败条件下,贪婪正向预测自利倾向;在较少存在腐败的低腐败条件下,贪婪对自利倾向的预测作用消失。类似地,Wu等人(2022)发现高特质敬畏可抑制贪婪对互利倾向的负向预测作用。本研究则将在结构权力的背景下,进一步探讨可抑制贪婪者自利倾向的积极因素。

1.2 结构权力的调节作用

权力是一种个体通过控制和分配资源来影响他人的能力(Galinsky et al., 2008)。权力既可视作一种心理状态,也可视作一种结构变量。在心理权力的研究中,权力感的启动与随后的心理行为测查任务相互独立,即先通过回忆或语义法启动心理权力感,随后通过其他情境考察其心理后效。权力的社会距离理论指出对有价值资源的不对称控制会使高权力者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较少依赖他人,由此权力会增加个体的社会距离感,增强个体的自我中心性,而减少对他人的关注(Magee & Smith, 2013)。正如,高心理权力往往抑制个体的亲社会倾向,减少公平行为,促进道德伪善,减少同理心,并增加自利行为(Blader & Chen, 2012; 周天爽等, 2020)。以往研究多从心理权力的角度考察权力的消极行为后果,这使得人们普遍将“权力”与负面结果联系在一起,如高权力者更加自私自利、冷漠无情等。然而,这一视角忽略了权力产生的社会关系。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看,权力起源于维护群体利益的需要,掌权者通过获取和分配资源化解群体内矛盾,应对外界威胁,进而增进集体福祉(Maner & Mead, 2010)。另外,权力的交互影响模型认为社会与组织中的权

力更意味着责任和社会义务(Keltner et al., 2008),正如组织中的掌权者也会表现出利他行为(如带头捐款、关心下属)。

最近研究者注重从结构权力(structural power)的研究视角拓展权力的积极效应。此类研究通过让被试拥有对有价值资源的实际掌控权来操纵权力,或将权力操纵嵌入到相关的心理行为测查情境中(Tost, 2015)。此时高权力可抑制个体做出以牺牲组织利益为代价的自利倾向(Schaerer et al., 2018)。研究发现,当掌权者的责任意识增强时,其在组织情境中的自利倾向反而会减低(Rus et al., 2012),并更愿意接受他人的建议(De Wit et al., 2017)。此外,掌权者也会因其较高的责任感而更愿意承担令人不快的任务(Williams et al., 2022)。组织中的结构权力会激活个体的仁慈管理理念(即利用权力为其他群体成员谋取福利的观念),并使掌权者意识到下属对其的依赖性,进而增强内在责任感,使其表现出一种团结精神,促使掌权者表现出将他人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亲社会倾向(Tost & Johnson, 2019)。上述研究表明,结构权力增进了个体对组织和他人利益的考虑。结构权力的研究视角有助于丰富对权力概念的理解,也有助于减少权力的污名化,鼓励人们合理追求和利用权力,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由此,本研究从结构权力的视角出发,试图考察可抑制贪婪者自利倾向的积极情境因素。

场动力理论提出,行为不仅取决于个体内部因素,还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Lewin, 1939)。例如,贪婪特质能否外化为自利行为将受到情境因素的调节(Li et al., 2021)。那么,当贪婪者被赋予权力时,结构权力能否提升对组织及他人利益的考虑而抑制其自利倾向呢?与心理权力相比,结构权力可有效抑制个体对自我利益的关注(Tost & Johnson, 2019)。一方面,高结构权力所蕴含的责任感和组织认同感会抑制个体内心的贪念,降低贪婪对自利倾向的影响。另一方面,对于在组织中处于高位的掌权者而言,其自利行为可能会带来更高的声誉及地位损失,此时善于权衡利弊的贪婪者将更可能放弃自利行为以维护其现有地位(Bao et al., 2020)。据此,本研究认为在高结构权力下,个体的贪婪特质对其自利倾向的影响将会降低,即高结构权力可缓冲内在贪婪与外化自利倾向间的关系,由此提出假设1:结构权力可调节贪婪与自利倾向间的关系,在低结构权力条件下,贪婪可正向预测个体的自利倾向,但高结构权力条件下,二者的关系将得到抑制。

1.3 权力稳定性的作用

以往研究常将权力概念化为一个静态的二分变量。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组织中的权力往往是动态的、可变的。组织中的结构调整、考核奖惩会使原有的权力分配发生变化,无权者有机会拥有权力,掌权者亦可能掉落权力宝座。权力的动态变化会影响个体的权力感知,甚至可逆转权力的行为后效,如权力稳定性可调节权力对创造力(Sligte et al., 2011)、不道德行为(Kim et al., 2017)、人际互动(Mooijman et al., 2019)、公正行为(Zheng et al., 2019)和冒险行为(刘耀中等, 2022)的影响。这可能因为权力的不稳定性会干扰权力的心理效应(如权力对行为接近系统的激活),此时高权力者可能会因为害怕失去权力,反而更关注风险及损失(Marner et al., 2007)。

以往主要关注权力稳定性对心理权力后效的干扰,本研究将聚焦于结构权力。一方面,在权力不稳定的情境下,组织中的掌权者会感受到更大的工作压力(Feenstra et al., 2017),而压力所引发的自我损耗将降低利他行为(费定舟等, 2016);另一方面,由于掌权者随时面临着失去权力的风险,维持组织声誉的长远利益可能不会在其掌权期间立刻兑现,反之,尽可能获取当下利益更能够满足贪婪者的欲望。结构-心理权力与组织行为的因果模型基于前人研究指出当掌权者的权力不合法(即权力不适当或不合规)、对其自身能力不自信或权力地位受到威胁时,这种结构权力的不稳定性会使掌权者处于一种无助状态,此时结构权力本身所附带的责任感和亲社会性会被削弱,进而降低其行为后效(Tost, 2015),由此提出假设2:当凸显权力的不稳定性时,结构权力的调节作用将被减弱。

本研究着眼于大学生群体,试图在结构权力背景下探讨贪婪与自利倾向间的关系。研究1将探讨结构权力对贪婪与自利倾向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2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当权力不稳定时,结构权力的调节作用是否依然存在。

2 研究1 贪婪与自利的关系:结构权力的调节作用

2.1 研究目的

研究1旨在通过客观操纵个体的结构权力,以考察其在贪婪与自利间的调节作用,探索高结构权力能否有效抑制贪婪外化为自利倾向。

2.2 研究方法

2.2.1 被试

使用G*Power计算所需样本量,为达到中等效应量($f^2 = 0.15$, $\alpha = 0.05$, $power = 0.95$)最少需要119名被试。研究1随机招募200名大学生,剔除7个漏填、乱填的无效数据后得到有效数据193份,其中男生86名,女生107名,平均年龄为20.70岁($SD = 2.10$)。

2.2.2 研究材料与程序

(1) 贪婪特质的测量

采用Seuntjens等人(2015)开发的贪婪特质量表(Dispositional Greed Scale)。该量表经Liu等人(2019)翻译,在中国人样本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Cronbach's $\alpha = 0.89 \sim 0.91$),是测查贪婪特质的常用工具(Bao et al., 2020; Li et al., 2021)。量表共7个项目,如“我总是想要更多”、“不管拥有多少,总是不能令我完全满足”,采用5点评分(1 = 非常不同意,5 = 非常同意),平均得分越高表明贪婪倾向越高(Cronbach's $\alpha = 0.75$)。

(2) 结构权力的操纵与自利的测量

参照Gu等人(2019)的研究,将结构权力的操纵嵌入自利行为的测量情境中(低结构权力组96人,高结构权力组97人)。自利行为的测量参照Tan等人(2017)的研究:

想象一下,你是大学志愿者协会的一员。一个慈善组织向你们学校提供了一项海外奖学金,每年有5个名额,有超过50名的候选人想得到这个奖学金。因此,学校将基于候选人参与志愿者活动的小时数进行选拔,志愿服务时间最长的5名候选人将有机会获得奖学金。

有位同学想要出国深造,但是他没有参加过任何的志愿活动。他希望获得一份你们协会的志愿服务证明,表明他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参加志愿者活动,这将大大提高他获得奖学金的机会。现在,他找到你并愿意给你2000元,希望你能向他提供一份虚假证明。

采用角色扮演法操纵个体的结构权力。在高结构权力条件下,被试阅读并想象该情境:“你是大学志愿者协会的主席,在协会的决策中拥有很高的决定权,你负责给协会成员分配任务,并对他们的表现做出评估和奖励”;在低结构权力条件下,被试阅读并想象该情境:“你是大学志愿者协会的一名成员,协会主席在协会的决策中拥有很高的决定权,他/她负责给协会成员分配任务,并对你们的表现做出评

估和奖励”。结构权力操纵完成后,被试需回答改编自 Huang 等人(2011)研究中的 3 个项目(如“我感到自己充满权力”)以检验操纵的有效性。采用 5 点评分(1 = 非常不同意,5 = 非常同意),平均得分越高,表明结构权力越高(Cronbach's $\alpha = 0.83$)。随后,被试需要回答改编自 Tan 等人(2017)的 3 个项目以测量自利倾向,如“我想我会接受这笔钱,并给他提供虚假的志愿服务证明”“我不会考虑接受这笔钱”(反向计分)。采用 5 点评分(1 = 非常不同意,5 = 非常同意),平均得分越高,表示自利倾向越高(Cronbach's $\alpha = 0.89$)。由于年龄及性别与贪婪等核心变量密切相关(Seuntjens et al., 2015),因此,收集被试的基本人口学信息以排除潜在影响。

2.3 结果与讨论

2.3.1 结构权力的操纵检验

独立样本 t 检验表明,结构权力操纵对被试的权力体验有显著影响,高结构权力组($M = 3.45$, $SD = 0.87$)的权力得分显著高于低结构权力组($M = 2.73$, $SD = 0.95$), $t(191) = 5.56$, $p < 0.001$,Cohen's $d = 0.80$,说明结构权力操纵有效。

2.3.2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各变量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贪婪及结构权力与自利的相关均不显著;年龄和性别与主要变量的相关不显著,因此未纳入后续统计分析。

表 1 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结果

变量	M	SD	1	2	3	4
1 年龄	20.70	2.10	-			
2 性别	0.55	0.50	0.50***	-		
3 贪婪	3.16	0.65	0.08	0.02	-	
4 结构权力	0.50	0.50	0.08	0.09	0.09	-
5 自利	1.70	0.86	-0.00	-0.10	0.12	-0.05

注:性别:0 = 男,1 = 女;结构权力:0 = 低结构权力,1 = 高结构权力;* $p < 0.05$,*** $p < 0.001$,下同。

2.3.3 贪婪与自利的关系:结构权力的调节作用

考察结构权力对贪婪与自利关系的调节作用。如表 2 所示,以贪婪、结构权力及二者交互项为预测变量,以自利为结果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贪婪及结构权力的主效应均不显著,但贪婪与结构权力的交互项显著负向预测自利倾向,即结构权力可调节贪婪与自利的关系。

进一步检验不同结构权力条件下贪婪对自利的

预测作用(图 1)。简单斜率分析表明,在低结构权力条件下,贪婪显著正向预测自利倾向($simple\ slope_{低} = 0.49$, $t = 3.77$, $p < 0.001$);但在高结构权力条件下,贪婪对自利倾向的预测不显著($simple\ slope_{高} = -0.16$, $t = -1.22$, $p = 0.23$)。

表 2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自利				
	R^2	$F(df)$	β	t	p
第一步	0.02	1.89(2)			
贪婪			0.13	1.80	0.074
结构权力			-0.07	-0.90	0.368
第二步	0.08	5.27(3)			
贪婪 × 结构权力			-0.34	-3.44	0.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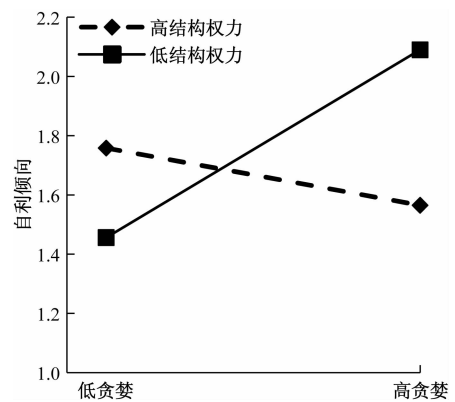


图 1 结构权力对贪婪与自利关系的调节作用

2.4 讨论

研究 1 通过操纵被试在自利任务中的结构权力,探究结构权力在贪婪和自利间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结构权力可调节贪婪与自利的关系,即高结构权力能够缓冲贪婪对自利倾向的正向预测作用(支持假设 1)。研究 1 的结果验证了结构权力的积极效应(Tost & Johnson, 2019),证明当个体在组织中被赋予权力时,其激活的责任感抑制了贪婪个体的自利倾向。研究 1 考察的结构权力默认是稳定和安全的,研究 2 进一步探讨当结构权力不稳定时,其在贪婪与自利倾向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是否会发生变化。

3 研究 2 贪婪与自利的关系:不稳定性结构权力的调节作用

3.1 研究目的

研究 2 在结构权力不稳定的背景下,检验结构权力在贪婪与自利间的调节作用是否依然存在。

3.2 研究方法

3.2.1 被试

研究2随机招募200名大学生,剔除17个漏填、乱填的无效数据后得到有效数据183份,其中男生90名,女生93名,平均年龄19.93岁($SD = 2.71$)。

3.2.2 研究程序

(1) 特质贪婪的测量

同研究1,采用Seuntjens等人(2015)的特质贪婪量表(DGS)进行测量(Cronbach's $\alpha = 0.77$)。

(2) 不稳定性结构权力的启动与自利倾向的测量

同研究1,研究材料采用大学生志愿者协会的腐败场景(Tan et al., 2017),被试均被分配到结构权力不稳定的情境中,其中低结构权力组91人,高结构权力组92人。权力不稳定的操纵材料在研究1基础上进行改编:在高权力不稳定组,在材料中加入“不过,为了保证志愿者协会管理的良性发展,每学年会重新改选主席。由现任协会成员和愿意进入新一届协会的同学进行自我称述,然后由全体同学对每个竞选同学进行不记名评分(1~10分)。作为现任主席,你的平均得分如果低于6分或低于其他竞选人,那么主席职位就会被新人所取代。”在低权力不稳定组,向被试呈现材料“作为协会成员,你的平均得分如果高于现任协会主席以及其他竞选人,那么你将当选为新一届的协会主席。”为了检验该情境是否有效凸显了结构权力的不稳定性,另招募67名被试对4种情境(稳定-高结构权力,稳定-低结构权力,不稳定-高结构权力,不稳定-低结构权力)下的感知权力稳定性进行评定(1=非常不稳定,7=非常稳定)。方差分析表明,权力稳定性的主效应显著, $F(1, 66) = 21.40, p < 0.001$,偏 $\eta^2 = 0.25$,被试在权力稳定条件下的稳定感知($M = 4.63, SD = 0.15$)显著高于不稳定条件($M = 3.98, SD = 0.15$),说明不稳定结构权力的启动材料是有效的。

材料阅读完毕后,要求被试回答自编项目“我在协会中拥有很高的权力”以检查结构权力操纵的有效性。采用5点评分(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平均得分越高,表示结构权力水平越高。随后,同研究1,阅读上述情景后被试需要回答3个项目(Tan et al., 2017)以测量自利倾向(Cronbach's $\alpha = 0.85$)。最后,收集被试的基本人口学信息。

3.3 结果与讨论

3.3.1 结构权力的操纵检验

独立样本 t 检验表明,高结构权力组($M = 3.74, SD = 0.86$)的权力得分显著高于低结构权力组($M = 2.78, SD = 1.18$), $t(181) = 6.27, p < 0.001$,Cohen's $d = 0.93$,说明结构权力操纵有效。

3.3.2 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各变量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贪婪与自利呈显著正相关,结构权力与自利的相关不显著;性别与自利的相关显著,即男性的自利倾向高于女性,因此在后续分析中将性别作为控制变量。

表3 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结果

变量	<i>M</i>	<i>SD</i>	1	2	3	4
1 年龄	19.93	2.71	-			
2 性别	0.51	0.50	0.01	-		
3 贪婪	3.24	0.73	0.10	0.02	-	
4 结构权力	0.50	0.50	0.11	0.03	0.01	-
5 自利	1.90	0.86	0.03	-0.33***	0.29***	0.15

3.3.3 贪婪与自利的关系:不稳定性结构权力的调节作用

进一步考察权力不稳定背景下,结构权力对贪婪与自利关系的调节作用。如表4所示,以性别为控制变量,以贪婪、结构权力及二者交互项为预测变量,以自利为结果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可显著预测自利倾向;贪婪和结构权力的主效应显著,即结构权力不稳定时,贪婪和结构权力均可正向预测个体的自利倾向;贪婪与结构权力的交互项对自利的预测作用不显著,即在权力不稳定背景下结构权力未能调节贪婪与自利的关系。

表4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自利				
	R^2	$F(df)$	β	t	p
第一步	0.11	21.51(1)			
性别				-0.33	-4.64 <0.001
第二步	0.21	16.27(3)			
贪婪				0.29	4.38 <0.001
结构权力				0.15	2.27 0.024
第三步	0.22	12.28(4)			
贪婪×结构权力				0.21	0.67 0.503

3.4 讨论

研究2探讨了不稳定性结构权力下贪婪与自利倾向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当凸显权力的不稳定性

时,结构权力在贪婪与自利间的调节作用不显著(支持假设 2)。换言之,当个体的权力地位可能发生改变并有机会暴露于腐败场景时,高结构权力对贪婪与自利之间关系的抑制作用消失,即无论结构权力高低,贪婪均会增进个体自利倾向。以往研究考察了心理权力的不稳定对权力效应的干扰作用(刘耀中等, 2022),本研究则在结构权力的视角下验证了结构权力的不稳定亦会削弱其积极效应。

4 综合讨论

本研究试图在结构权力背景下探讨贪婪与自利间的关系。研究 1 发现结构权力可调节贪婪与自利间的关系,即高结构权力可缓冲贪婪对自利的预测作用,支持假设 1。研究 2 则进一步发现,当凸显结构权力的不稳定性时,结构权力未能有效调节贪婪与自利间的关系,即此时高结构权力未能有效抑制贪婪外化为自利倾向,支持假设 2。

以往研究发现,贪婪者往往具有较高的自利倾向(Wang et al., 2019)。但本文发现,贪婪与自利的关系并非稳定不变,正如研究 1 发现,高结构权力条件下贪婪对自利倾向的预测失效。这可能因为掌权者肩负着来自组织和他人的期望并会意识到下属对其的依赖,进而唤起其内在责任感,令其倾向于以善意的方式行使权力(如坚持公平决策,以集体利益为先等)(Smith & Hofmann, 2016; Tost, 2015),此时结构权力所诱发的责任感会降低高贪婪者的自利倾向。本结果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贪婪与自利之间关系的理解,即内心的贪念能否外化为自利会因行动情景而变(Li et al., 2021)。本研究并未支持“权力导致腐败”这一常识,却体现出结构权力的亲社会属性,即权力可能会通过诱发责任意识,抑制贪婪者的自利倾向。这也可能源于本研究是在一个虚拟的情景中操纵结构权力并对行为意图进行测查,与真实世界中与权力相关的复杂社会情景存在差异,但本研究至少能说明结构权力本身意味着高责任,而非特权与腐败,即权力本身并非导致腐败的充分条件(Scholl et al., 2018)。

本研究也发现,权力的调节作用存在边界条件,即权力会抑制个体将贪婪特质外化为自利倾向,但当凸显权力不稳定性时,该调节作用消失。前景理论认为(Kahneman & Tversky, 1988),面对同等数量的收益和损失时,与得到某样东西相比,人们总是对失去已有的东西更为敏感。因此,不稳定的权力会引发掌权者对权力丧失的担忧,正如当灵长类动物处

于稳定的权力等级结构中时,高权力成员往往具有相对较低的压力水平,但当等级制度不稳定时,高权力则会导致更大的心理和生理压力(Sapolsky et al., 2005)。已有证据表明,权力稳定性会改变掌权者的行为方式。掌权者对权力丧失的恐惧会促使其表现出更强的自利倾向,即在竞争激烈的组织环境中领导者关注个人利益而牺牲他人利益的现象将更加凸显(Wisse et al., 2019)。另一方面,权力流动、人事调整也暗含着组织对掌权者缺乏信任,体验到不信任的个体可能会降低其遵守用权规范的行为动机(Mooijman et al., 2019)。由此,当结构权力不稳定性时,其在贪婪与自利倾向之间的调节作用消失。此外,本研究还发现,权力不稳定性时,男性的自利倾向显著高于女性,而在权力稳定时,该差异不显著。这可能因为权力的稳定性调节了性别对自利行为的影响。威胁-需求理论认为,个体对需求的敏感程度将影响其情境应对方式(Lee & Shrum, 2012)。与高关系需求的女性相比,男性在威胁情境下具有高自我关注性(王紫薇,涂平,2014)。另外,社会支配理论认为,男性(相比女性)具有更强烈的维持其群体主导地位的倾向(Sidanius et al., 1994)。权力的不稳定性可视为对自身地位的一种威胁,此时男性或会为维持其自身优势而更加关注自我利益的满足。因此,当凸显权力的不稳定性时,男性将比女性表现出更高的自利倾向(研究 2),但当权力稳定时,这种性别差异会被弱化(研究 1)。

本研究对于我们在结构权力背景下思考贪婪与自利倾向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对于我们有效开展大学生思政教育以及促进心理反腐具有重要的实践启示。首先,组织中的权力不仅意味着机会与资源,更蕴含责任与担当(Scholl et al., 2018),这也提示我们在大学生管理实践中,除了课堂的思政教育外,通过让其承担一定的领导职责,有利于培养其集体意识,维护道德底线,抑制其贪婪外化为自利倾向。其次,“权力导致腐败”的概念深入人心,但本研究并未支持这一世俗观点,如当那些道德认同及责任意识较高的个体掌权时,其自利倾向反而会降低(DeCelles et al., 2012; Rus et al., 2012)。过分夸大权力的消极面会导致公众对掌权者的污名化以及对高社会腐败的刻板认知,这样反而会促进个体的内在贪欲外化为自利倾向(Li et al., 2021)。政府和媒体可从权力的积极面入手,将权力更多地与责任、社会期望和集体利益相联系,将有助于形成良好的舆论导向与社会风尚。最后,过于凸显权力

的不稳定性可能会破坏掌权者的内生责任感,这提示我们未来在保障有效权力监管的同时,也应重视维护掌权者的稳定感(Gu et al., 2019),以增强其维护集体利益的自觉性及抵制贪欲的内在定力。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在未来的研究中有待改进及拓展。首先,为了便于取样,本研究均采用大学生被试,该取样可能缺乏一定的代表性,未来可在真实的组织环境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权力样本(如公司领导、下属),以提高研究的外部效度。其次,本研究采用题项测查被试的自利倾向而非其实际的自利行为,未来可考虑使用更多的研究范式(如独裁者游戏、社会困境等)测量自利行为(DeCelles et al., 2012)。最后,本研究表明,结构权力可缓冲贪婪与自利倾向间的关系,但并没有揭示其内在作用机制,未来可从责任感或利弊权衡的角度进一步探讨其内在的影响机制。

5 结论

结构权力可调节贪婪与大学生自利倾向间的关系,即高结构权力能够抑制贪婪外化为自利倾向,但当凸显组织中的权力不稳定时,这种抑制作用消失。

参考文献:

- Bao, R., Sun, X., Liu Z., Fu, Z., & Xue, G. (2020). Dispositional greed inhibits prosocial behaviors: An emotive - social cognitive dual - process model. *Current Psychology*, 41, 3928 - 3936.
- Batson, C. D. (1998). Altruism and prosocial behavior. In D. T. Gilbert, S. T. Fiske, & G. Lindzey (Eds.), *The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pp. 282 - 316). McGraw - Hill.
- Blader, S. L., & Chen, Y. R. (2012). Differentiating the effects of status and power: A justic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2(5), 994 - 1014.
- Chen, B. (2018). An evolutionary life history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greed.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27, 74 - 78.
- DeCelles, K. A., DeRue, D. S., Margolis, J. D., & Ceranic, T. L. (2012). Does power corrupt or enable? When and why power facilitates self - interested behavior.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7, 681 - 689.
- De Wit, F. R. C., Scheepers, D., Ellemers, N., Sassenberg, K., & Scholl, A. (2017). Whether power holders construe their power as responsibility or opportunity influences their tendency to take advice from others.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38(7), 923 - 949.
- Feenstra, S., Jordan, J., Walter, F., Yan, J., & Stoker, J. I. (2017). The hazard of teetering at the top and being tied to the bottom: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of power, stability, and 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 with work stress. *Applied Psychology*, 66(4), 653 - 673.
- Galinsky, A. D., Magee, J. C., Gruenfeld, D. H., Whitson, J. A., & Liljenquist, K. A. (2008). Power reduces the press of the situation: Implications for creativity, conformity, and dissona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5(6), 1450 - 1466.
- Griskevicius, V., Tybur, J. M., Delton, A. W., & Robertson, T. E. (2011). The influence of mortality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on risk and delayed rewards: A life history theory approach.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0(6), 1015 - 1026.
- Gu, Z., Liu, L., Tan, X., Liang, Y., Dang, J., Wei, C., ... Wang, G. (2019). Does power corrupt?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statu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55(4), 499 - 508.
- Huang, L., Galinsky, A. D., Gruenfeld, D. H., & Guillory, L. E. (2011). Powerful postures versus powerful roles: Which is the proximate correlate of thought and behavior? *Psychological Science*, 22(1), 95 - 102.
- Kahneman, D., & Tversky, A. (1988).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In P. Gärdenfors & N. - E. Sahlin (Eds.), *Decision, probability, and utility: Selected readings* (pp. 183 - 21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eltner, D., Van Kleef, G. A., Chen, S., & Kraus, M. W. (2008). *A reciprocal influence model of social power: Emerging principles and lines of inquiry*. Waltham: Elsevier Inc.
- Kim, J., Shin, Y., & Lee, S. (2017). Built on stone or sand: The stable powerful are unethical, the unstable powerful are not.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44(2), 437 - 447.
- Lee, J., & Shrum, L. J. (2012).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versus charitable behavior in response to social exclusion: A differential needs explanation.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39(3), 530 - 544.
- Lewin, K. (1939). Field theory and experiment in social psychology: Concepts and method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4, 868 - 896.
- Li, X., Dang, J., Liu, L., Liang, Y., Wei, C., & Gu, Z. (2021). Are greedy individuals more corrupt? *Current Psychology*, 42, 165 - 173.
- Liu, Z., Sun, X., Ding, X., Hu, X., Xu, Z., & Fu, Z. (2019).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Dispositional Greed Scale and a portrait of greedy peopl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37, 101 - 109.
- Magee, J. C., & Smith, P. K. (2013). The social distance theory of power.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7, 158 - 186.
- Maner, J. K., Gailliot, M. T., Butz, D. A., & Peruche, B. M. (2007). Power, risk, and the status quo: Does power promote riskier or more conservative decision making?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3(4), 451 - 462.
- Maner, J. K., & Mead, N. L. (2010). The essential tension between leadership and power: When leaders sacrifice group goals for the sake of self - interes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9(3), 482 - 497.
- Miller, D. T. (1999). The norm of self - interest. *American Psychologist*, 54(12), 1053 - 1060.
- Mooijman, M., Van Dijk, W. W., Van Dijk, E., & Ellemers, N. (2019). Leader power, power stability, and interpersonal trust.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52, 1 - 10. <https://doi.org/10.1016/j.obhdp.2019.03.009>

- Müller, M. M., Kals, E., & Maes, J. (2008). Fairness, self-interest, and cooperation in a real-life conflict.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38*, 684–704.
- Razen, M., & Stefan, M. (2019). Greed: Taking a deadly sin to the lab. *Journal of Behavioral and Experimental Economics, 81*, 164–171.
- Rus, D., Van Knippenberg, D., & Wisse, B. (2012). Leader power and self-serving behavior: The moderating role of accountability.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23*(1), 13–26.
- Sajko, M., Boone, C., & Buyl, T. (2021). CEO gree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to systemic shocks. *Journal of Management, 47*(4), 957–992.
- Sapolsky. (2005).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hierarchy on primate health. *Science, 308*(5722), 648–652.
- Schaerer, M., Lee, A. J., Galinsky, A. D., & Thau, S. (2018). Contextualizing social power research with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In Ferris D. L., Johnson R. E., & Sedikides C. (Eds.), *The self at work: Fundamental theory and research* (pp. 194–221). Routledge.
- Scholl, A., De Wit, F. R. C., Ellemers, N., Sassenberg, K., Fetterman, A. K., & Scheepers, D. (2018). The burden of power: Construing power as responsibility (rather than as opportunity) alters threat–challenge respons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4*, 1024–1038.
- Seuntjens, T. G., Van De Ven, N., Zeelenberg, M., & Van Der Schors, A. (2016). Greed and adolescent financial behavior.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57*, 1–12. <https://doi.org/10.1016/j.joep.2016.09.002>
- Seuntjens, T. G., Zeelenberg, M., Van De Ven, N., & Breugelmans, S. M. (2015). Dispositional greed.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8*, 917–933.
- Seuntjens, T. G., Zeelenberg, M., Van de Ven, N., & Breugelmans, S. M. (2019). Greedy bastards: Tes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anting more and unethical behavior.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38*, 147–156.
- Sidanius, J., Pratto, F., & Bobo, L. (1994). 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 and the political psychology of gender: A case of invaria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7*(6), 998–1011.
- Sligte, D. J., De Dreu, C. K., & Nijstad, B. A. (2011). Power, stability of power, and creativit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7*(5), 891–897.
- Smith, P. K., & Hofmann, W. (2016). Power in everyday lif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3* (36), 10043–10048.
- Tan, X. Y., Liu, L., Huang, Z. W., & Zheng, W. W. (2017). Working for the hierarchical system: The role of meritocratic ideology in the endorsement of corruption. *Political Psychology, 38* (3), 469–479.
- Tost, L. P. (2015). When, why, and how do powerholders “feel the power”? Examining the links between structural and psychological power and reviv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35*, 29–56.
- Tost, L. P., & Johnson, H. H. (2019). The prosocial side of power: How structural power over subordinates can promo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52*, 25–46.
- Van den Heuvel, M. I., Seuntjens, T. G., Ang, D., Lewis, T., & Zeelenberg, M. (2022). I want more! The role of child, family and maternal characteristics on child dispositional greed and sharing behavior. *Current Psychology, 42*, 22837–22846.
- Wang, L., Wang, Z., & Weng, D. H. (2019). *Individual, educational, and other social influences on greed: Implications for the study of white-collar crim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illiams, M. J., Lopiano, G., & Heller, D. (2022). When the boss steps up: Workplace power, task responsibility, and engagement with unpleasant task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70*, 104140. <https://doi.org/10.1016/j.obhdp.2022.104140>
- Wisse, B., Rus, D., Keller, A. C., & Sleebos, E. (2019). “Fear of losing power corrupts those who wield it”: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leader fear of losing power and competitive climate on leader self-serving behavior. *European Journal of Work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28*(6), 742–755.
- Wu, Q., Zhang, Y., He, W., & Cui, L. (202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olescents’ materialism and cooperative propensity: The mediating role of greed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aw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89*, 111484.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21.111484>
- Zheng, M. X., Schuh, S. C., Van Dijke, M., & De Cremer, D. (2021). Procedural justice enactment as an instrument of position protection: The three-way interaction between leaders’ power position stability, followers’ warmth, and followers’ competence.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42*(6), 785–799.
- 费定舟, 钱东海, 黄旭辰. (2016). 利他行为的自我控制过程模型: 自我损耗下的道德情绪的正向作用. *心理学报, 48*(9), 1175–1183.
- 黄河. (2020). 精致的利己主义对大学生的危害及对策.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35*(10), 60–62.
- 刘耀中, 郑雪琴, 窦凯. (2022). 权力不稳定性对权力效应的逆转作用. *心理科学, 45*(1), 82–89.
- 王紫薇, 涂平. (2014). 社会排斥情境下自我关注变化的性别差异. *心理学报, 46*(11), 1782–1792.
- 周天爽, 潘玥杉, 崔丽娟, 杨莹. (2020). 权力感与助人行为: 社会距离的中介和责任感的调节. *心理科学, 43*(5), 1250–125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Greed and Self-interest: The Moderating Role of Structural Power

LI Xiaoming^{1,2,3,4} MENG Yuan¹ ZHANG Siming¹

(1.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2. Institute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3. Center of Cultur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4. Cognition and Human Behavior Key Laboratory of Hunan Province, Changsha 410081)

Abstract: Greed is a key driver that leads to self-interest, and self-interested behavior often occurs in a certain power context. The present study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eed and self-interested behavior in the context of structural power among college studen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tructural power could negatively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eed and self-interest. In the low structural power condition, greed positively predicted self-interest. A high level of structure power could inhibit the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f greed on self-interested behavior (Study 1). However, the inhibition effect disappeared when structural power was unstable (Study 2). In conclus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structural power can inhibit the externaliz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greed into self-interested behavior, but the instability of power reduces this inhibiting effect.

Key words: greed; structural power; self-interest